

践中,对御膳的调剂、选料、配方以及烹饪,均作记录“以验后效”。从而保证了“饮食百味之宜”,并对饮食营养卫生很有研究。他在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与官至赵国公的普兰奚合作,于1330年著成《饮膳正要》。

四、药事制度与药材贸易

(一) 药事制度

金元时期的药政主要承袭唐宋制度。金代御药院仍掌御用汤药果茶。金世宗时礼部设惠民司,掌修合发卖汤药,治疗民间疾患。其性质同于宋代官药局。

元代药政设施更加健全:御药院、御药局管理各地区贡献的药品和制作汤剂(《元史·百官志》)。典药局专为太子服务。13世纪在燕京、大都(北京)、上都(多伦)以及地方各路均设置惠民局,管理经营药物制剂和售卖等。还设有广济提举司,掌修合药饵,以施贫病者。1270年设广惠司,由阿拉伯医生配制回回药物,供御用和治疗卫士等。1292年在大都、上都设回回药物院,管理回回药事,隶属广惠司(《元史·百官志·食货志》)。

元代药品管理严格,医药政令方面禁售毒药、猛烈药和堕胎药品,如乌头、巴豆、砒霜、大戟、天雄、蓖蓉等。其致人于死,买卖双方都处死刑。并禁聚众售药,违者处以重罪。

(二) 药材贸易

金代药材来源除所辖五十九路土贡的70余种地道药材外,其余药物主要来自南京路开封府所设的四个药市和榷场贸易(《金史·地理志》)。尽管其他各路榷场贸易因宋金战争时开时闭,但有的榷场,如大定年间(1161—1189年)的泗州榷场,每年仅药材苏木就供进千斤,生姜六千斤,梔子九十称(即1350斤),还有荔枝、龙眼、橄榄、柑橘等水果一万五千余斤,可见榷场也是药材来源的重要渠道。但是由于金代禁榷制度甚严,榷场设场官及提控所管理。尤其不许“见钱入外界”,不许与外人交易,否则判刑五年乃至死刑(《金史·食货志》)。这也一定程度地限制了药材的交易,再加战争的影响,因此,金代的药源已难比唐宋之广阔。

两宋的药业已发展到有史以来的顶峰阶段,元代的军事征服,使其遭到了严重破坏。待战争停止,社会秩序恢复后,各地药市以及沿海的市舶贸易又逐渐恢复。元代疆域“北逾阴山,西极流沙,东尽辽左,南越海表”(《元史·地理志》),药材来源丰富,除每年各路岁贡,药材贸易也十分活跃。

元代药材贸易的兴旺,为明代本草繁荣提供了一定条件。

五、中外药学交流

金元时期中外药物交流更加广泛,尤其元代除沿袭宋代市舶司海路贸易外,同时还有陆路与国外交往。海外贸易活跃,增加了药物交流。金元时期,相当于朝鲜高丽医学时代后期,中国医药包括医政制度、分科、医书等,对高丽医学体系的形成有极大影响,两国医家也往来频繁。但与宋代大量赐给朝鲜药物不同,元代朝廷却多次求索朝鲜地产药材,如人参、松子等。《高丽史》载有13、14世纪元代朝廷索求“海东三山的药物”情况,有时一年献给元帝的人参竟达数百斤。高丽人参在中国久享盛名,虽然《茶经》说:“人参上者生上党,中者生百济、新罗,下者生高丽”,但至宋代“上党人参殆不复售”。《开宝本草》指出“人参见用多高丽、百济者”。松子向来是中医养生要药,久服可健身益寿。上两药在元代盛行,也表明当时重道家养生之术。

忽必烈于1274年、1281年两次与日本交战,结果失败。因此元代与日本官方往来处于低谷,但民间交往仍很频繁。后元代朝廷采取和平修好政策,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逐渐扩大,医药传播也随之扩展起来。香药、医书、佛像等,成为日商热衷的物

品。14世纪日本《有林福田方》一书载有许多宋以后的药物,如威灵仙、乌蛇、乌药、延胡索等,大体都是元代输入的。这类药物都成为日本医学史上“后世派”方药中常用之品。还有元代木刻版医书对日本的输出,都表明了元代中日医药交流的若干盛况。

元代同印支、南亚地区的药材贸易比较频繁,“至元十年(1273年)诏遣扎术呵押失寒、崔杓持金十方两,命诸王阿不合市药狮子国(斯里兰卡)”(《元史·世祖纪》)元人周达观《真腊风土记》一书欲得唐货条目中,提到水银、银朱、硫黄、白芷、檀香等中国药物,反映了当时对南亚地区药物输出情况。《元史》多处记载有安南、罗斛、占城、真腊等国贡献药材事项。

元代与阿拉伯地区的医药交流,延续了唐、宋时期的势头。马可波罗在《行记》中记述有中国药材外运的情况,如在马拉巴看到大批中国船只,装载大宗中国药材同其他货物,被运往亚丁港,再转运到亚历山大等地。书中具体记述了中国的姜、茶、大黄、麝香、肉桂等传入阿拉伯诸国。劳费尔在《中国伊朗编》(1919年)一书中谈到中国栽培植物史对伊朗古代文明作出的贡献,特别提到中国的桂皮、生姜、大黄、黄连等输往伊朗的情况。元代在输出药物的同时,也输入了阿拉伯医药知识,如朱震亨在《丹溪心法》中记述的“倒仓法”,云“其方出于西域”,实际上该法是源自穆斯林教洗礼前的卫生习俗。又如糖浆剂(舍利别)本发源于阿拉伯,早在1268年由撒马尔罕的医师马·萨里吉思将其制法传入中国。他在广州的荔枝湾管理官营的果菜园,利用柠檬树果制成柠檬糖浆,献给北京的宫廷。13世纪阿拉伯人爱薛,在北京行医,后被聘管理广惠司。其后的回回药物院、《回回药方》等,对传播阿拉伯医药,丰富我国医学,均有贡献。《饮膳正要》所收录的马思答吉、回回豆子、必思答、八担仁、西天茶饭、撒速汤、八儿不汤等,都是包括阿拉伯在内的西域特产。

元代的军事扩张,刺激了欧洲探险家、传教士和商人,他们在发现美洲大陆前相继来到广州、泉州等地。13世纪西人天文兼语言和医学专家伊赛亚,最早被元代宫廷聘用,并于1272年获准在燕京开设医院。法兰西教士孟德维诺·约翰于1294年在燕京传教行医。欧洲商人也热衷于贩运中国等东方商品,其中包括许多中国药材。如被称为万能药的郁金,在欧洲曾以四倍于黄金的价格出售。

元代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位置,对中西方医药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,它使外来医药的传入,由民间的、小范围的发展到合法的行医、卖药直至开办医院,从此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。

第七节 明代的本草学 (1368—1644年)

朱元璋于1368年依靠农民起义推翻了元代统治,建立了明王朝。明王朝建立之初,采取了一系列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政策,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不少改革措施,诸如改组中央和地方机构,建立卫所与里甲制度,废除元代的奴隶制,使奴隶变成自由民。鼓励垦荒,增加耕地,兴修水利,扩大水稻种植,并培育良种,推广种植棉花、桑麻。减轻赋税,扶持手工业与商业,使开矿、冶炼、铸铁、制瓷、造船、棉纺、丝纺、造纸等许多行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,并出现了原始状态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。这一时期工商业城镇剧增,尤其是江南地区的一些城镇,呈现空前的繁荣景象。从而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,因此农业、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都大大超过前代,产生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。

随着经济的发展,科技文化也取得相应的进步。明代中叶